

# 反對派被「港獨」分離主義捆綁

□楊 堅

## 【政情觀察】

香港居民（選民）在2017年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第五任行政長官的希望，因為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捆綁」地反對特區政府有關法案而失落。一些過去半年反覆爭取若干被標識為「溫和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轉軌」的朋友，尤其感到痛心，他們曾經一次又一次地「被以為」可能爭取至少4名反對派議員支持政府法案，但最終被無情的事實擊碎。

## 反對派整體趨於更激進

為什麼私下表示願意「轉軌」者無法公開實踐承諾？有一位身居建制高位的政界人士接受一個網絡媒體專訪時歸因於中央堅持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毫不動搖，沒有向那幾位願意「轉軌」者提供「下台階」。其實，問題的根源在於近兩年來反對派為愈益激進的政治趨向所「捆綁」。

從2013年初開始，反對派對待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態度就為「激進」所驅動。其標誌是，「佔領中環」計劃在是年1月問世後，迅速獲得反對派陣營集體支持。莫說在2010年上半年曾扮演「溫和民主派」的民主黨，即使多年來「又傾又砌」玩得亦不亦樂乎的民協領袖人

物，不知是身不由己抑或心嚮往之，也公開表示認同「佔中」計劃。

在如斯政治氛圍下，2013年4月9日，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拋出一個方案：接受提名委員會沿用現時1200人選舉委員會組成辦法，也同意提名委員會採取「機構提名」即「集體提名」方式，但條件是，中央同意取得最高提名票的前5位參選人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翌日，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和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相繼公開否定李柱銘方案，均振振有詞地表示：「泛民主派」爭取真普選，不以其代表人物能否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為重要考慮。李柱銘面對反對派陣營幾乎一致的強大反對，不得不在4月11日公開宣布收回其方案。這一事件的意義是：在基本法基礎上討論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的可能性被反對派堵死了。

於是，儘管隨後在反對派陣營中有主張「三軌制」的，有要求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基本法一起做香港特別行政區普選的法理依據的。但是，這一類企圖沖淡基本法的似乎「折衷主義」觀點，很快被完全否定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和「國際標準」所推倒。

值得重視的，即使湯家驊、羅致光、狄志遠、黃成智等，或者單獨或者共同提出所謂「溫和方案」，但是，他們要求中央做的讓步，均超過2013年4月李柱銘提

出的方案。是他們較李柱銘激進？不是。其實這是反對派整體趨於更激進。

在79天「佔中」行動發生後，若干親「泛民主派」學者頗為疑惑：為何「佔中」三位發起人和所有支持並參與行動的反對派政治團體竟然被學聯、學民思潮和其他一些激進民間團體「邊緣化」？道理很簡單，所有反對派政治團體都趨向於激進，所以，他們無法抗拒更為激進的社會勢力偏於極端的言論和行動。

誠然，更深刻的原因在於，英國管治香港逾一個半世紀所形成的傳統核心價值觀，從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轉化為香港本土主義。2003年七一遊行的口號是「反對廿三 還政於民」，是典型的本土主義政治表現。翌年，一群知識分子發表聯署聲明，公開宣告維護香港傳統核心價值旨在建設「香港命運共同體」，是典型的本土主義思想表現。

## 「港獨」分離主義走向末日

傳統核心價值一旦轉化為本土主義，就容易滑向「分離主義」。2011年1月以來，反對派不斷炮製抵制、反對和敵視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風潮；2012年9月，反對派以「準顏色革命」方式成功扼殺國民教育。這一切，推動本土主義向分離主義轉化，而「佔中」、「公

## 【焦點熱議】

曾淵滄

# 否決政改亂經濟 反對派難達目的

前一陣子，香港政改被提上立法會表決之前，股市出現一股沉重的壓力，有人在市場內散佈一個說法，說中央政府已為政改定下「一定要得」的要求，如果政改被否決，中央政府會處罰不聽話的香港人。有些傳媒更捕風捉影地大做文章。除了可能處罰不聽話的香港人之外，另一種說法是激進反對派在政改被否決之後，必然士氣大振，認為自己的捆綁戰術有效，今後必然會更進一步，搞出更激進的行動，並逼使溫和民主派也臣服於自己，一齊搞激進行動。激進行動必然搞到香港經濟大受打擊，從而影響股市。

## 「處罰」傳言完全胡說八道

六月十八日中午，政改在立法會被否決，當時股市正處於午休，下午一時股市復市，恒生指數一度急跌一百多點，但是，在數分鐘之內又急升兩百多點，這說明實際上股票投資者頭腦仍然是清醒的。再之後，內地A股狂跌，港股才隨之回跌，但是恒生指數的跌幅是很溫和的，與當日上海綜合指數狂跌比較，說明香港股市抗跌力很強。六月十九日，內地股市繼續大跌，上海綜合指數在六月十八日及十九日兩天的累積跌幅竟然高達一成，大有一場小股災的味道，而過去半年，香港股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內地A股影響，畢竟香港恒生指數成份股中已有大約一半是內地企業，而本地藍籌股也差不多全部在內地有生意，有投資。但是，奇跡地六月十九日，當上海綜合指數再狂跌6.42%時，香港恒生指數回升了，政改表決前歷任香港投資者的烏雲一掃而空，什麼中央政府在政改被否決之後會處罰香港人之說根本是一派胡言，是在挑撥香港人仇視中央政府而編造出來的說法。當然，編造這些說法的人也可能來自股票市場裡的大鱷，先製造恐怖的氣氛，壓低香港股市，然後在政改正式表決之後平倉，平掉之前的空倉，股票市場千奇百怪，什麼怪事都會發生。

香港回歸十八年，中央政府什麼時候處罰過香港人？回歸初期，中央政府認為香港得天獨厚，經濟條件很強，因此基本上很少針對香港特區事務做出任何事，甚至連每隔五年的五年國家發展規劃也沒有把香港考慮在內。但是，2003年香港經濟陷於谷底，又受到非典的影響，完全失去旅客的時候，自由行的政策出現了。很明顯，自由行改變了香港的經濟結構，部分激進的反對派為了破壞自由行、破壞香港經濟，才搞出「反水客」的行動。自由行之後，有CEPA，有高鐵，有港珠澳大橋，這一切都是協助香港保持自己的競爭能力。但是，反對派則處處阻礙，反高鐵、反港珠澳大橋，目的只有一個：破壞香港經濟。反對派認為，香港經濟越差，市民就會埋怨特區政府，他們奪權的目的就更能成功。

中央政府會在政改被否決之後處罰香港完全是胡說八道，那麼，激進反對派在政改之後認為自己大獲全勝而會發動更激進的破壞行動會不會阻礙香港的經濟前景？這也是不可能的事。反對派自以為得計是絕對錯誤的結論。是的，政改一役，特區政府輸了，建制派議員輸了，香港人輸了，但是，投否決票的議員們也輸了。他們輸掉了民意，政改表決之前，種種的民意調查顯示出支持政改的人比反對政改的人多，這些支持政改的人看到政改被否決，今後還會支持這些投票反對政改的議員及其政黨嗎？

不論是激進反對派或是溫和反對派，如果自以為得計，今後可能發動更大規模的不合作運動，發動大規模的民間動員，以群眾來迫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屈服。那麼，他們是大錯特錯，他們的如意算盤也一定打不響。道理很簡單，歷史上從來沒有失去民意支持的反對派力量能成功地發揮真正的影響力。回歸十八年，反對派在立法會選舉中往往能得約六成的選票。現在，反對政改的人不足五成，很肯定的反對派已失去過去的光環。是的，激進反對派可能仍然能保住他們的選票，但是政改投下否決票的溫和反對派就可能流失大量的支持票，相信他們也是心知肚明的。今後，溫和反對派一定會處處設法與激進反對派劃清界線，以免受制於激進反對派的激進行為。

## 製造動亂必然失去民意

因此，自以為得計而企圖發動更大規模的破壞香港經濟發展的行為不可能得到民意的支持。缺乏民意的支持，任何行動最終一定失敗。去年的「佔中」行動，開始時反對派士氣高昂，看到黑壓壓的激進人群，認為自己大獲全勝。但是，不必多久，民意已經轉向，失去民意支持的「佔中」行動未到清場時已經注定是失敗的行動。政改被否決，不少人說特區政府會面對管治困難。是的，反對派可以繼續搞拉布，阻止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但是，反對派每一次的激進行動，都會令他們失去一些選票，絕大部分的香港人是希望過一個平靜的生活，不希望看到動亂，想製造動亂的人必然會失去民意支持，缺乏民意支持，什麼行動都不可能成功。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 不能讓反對派金蟬脫殼

□蕭 平

立法會表決政改議案出現意外，33名建制派議員為了「等埋發叔」錯過投票，留下了難以挽回的遺憾。

這幾天，輿論聚焦「甩錨」的是是非非。支持政改的市民抱怨嗟嘆，批評指責，鬧事的議員惟有多番致歉，更有人禁不住流淚哽咽。市民的批評完全有理，畢竟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一次歷史性的投票。所以，33名議員誠懇接受，並召開發布會，發表聯署聲明，鄭重重申支持普選議案的立場。他們是正人君子，承認錯誤，吸取教訓，同時展示建制派陣營的意志和團結。如果設身處地從他們的角度看問題，「等埋發叔」無非是想全體建制派議員整齊齊齊投下贊成票，讓立法會的表決器記錄下歷史的真實。這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動機無可厚非。

至此，事情可以畫上句號了。其實誰都明白，即

使這33名議員投下贊成票，政改議案也逃不脫被扼殺的命運。阻礙拖延香港普選進程的是反對派議員，他們才是阻擋民主車輪的罪人，當受千夫所指！

一邊是考慮不周導致技術性失誤，一邊是罔顧民意剝奪港人普選權，性質截然不同，孰大孰小，孰輕孰重，自是一目瞭然。善良的人們萬萬不可因小失大，糾纏於細枝末節，讓反動派金蟬脫殼，逃過輿論的譴責。

筆者或許是杞人憂天了，當投票否決的那一刻，反對派已經把自己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無論他們如何辯解，這個罪責想甩也甩不掉。港人現在要做的是兩件事。一是給反對派記下這筆帳，到時候讓他們票價償。另一個就是放下政治爭拗，和特區政府一起聚焦經濟民生。

編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署名文章

# 反對派否決了「香港精神」

□魯 力

## 【有話要說】

政改以來，反對派以種種手段，甚至進行武力衝擊，在「黃色暴力」「捆綁否決」強力施壓之下，政改方案終遭反對派議員否決。這不僅僅是香港的民主發展只能原地踏步，雙普選遙遙無期，更與要求「一人一票」普選權的主流民意相違背。更為重要的是，香港的「同舟共濟」的獅子山精神成為政改方案被否決的最大犧牲品。反對派沉醉於政治爭鬥，加劇了香港社會內耗和撕裂。另一方面，反對派通過與中央公開對抗來回應，並非是一個現實的選擇。香港精神成為立法會表決的直接受害者。香港本身就是一個輸家。

## 破壞了社會「同舟共濟」

政改諮詢一開始，反對派就以「佔領中環」進行威脅。在全國人大政改方案公布之後，更是發起以衝擊立法會為起點的「佔中」行動。那些激進反對派以破壞社會秩序、破壞香港法制基礎，撕裂族群和諧為目標，任意在立法會、馬路和商舖等公共場所，進行社會破壞活動。在這場長達20個月的政改期間，反對派根本就不只是在進行理性的討論，而是以「我要真普選」「反對全國人大831決定」等政治口號，暴力性地在立法會議場、廣場街頭和媒體輿論上大搞「有我講，無你講」的民主霸權。他們不僅在各場合打黃傘，喊口號破壞不同意見者表達意見，甚至上演沿途追擊、圍堵、謾罵落區諮詢政改方案的政府官員，在立法會議事堂和各種場合公然污蔑特區行政長官。在立法會政改方案投票前夕，警方在香港西貢填海發現爆炸品原料，多名本土派激進組織人士被捕。

對於廣大市民來說，最感同身受的是反對派加大破壞香港經濟的力度，讓更多的人感受生存危機。從回歸以後的行為看，反對派通過破壞香港繁榮，破壞社會穩定，並把危機的責任嫁禍他人以拓展自己的政治空間。近年來，激進反對派策劃的針對港珠澳大橋

的司法覆核，組織力量延宕高鐵建設，以及對新機場第三條跑道的所謂司法覆核，都是激進反對派有明確意圖的破壞香港經濟的行為。再對照威脅攻擊內地遊客的「反水客」舉動，我們很容易看到有一條內在的主線貫穿始終，那就是破壞香港的經濟，讓香港的繁榮難以為繼，進而製造社會不穩，從中謀取反對派的奪權私利。

此次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後，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將沿用2012年選舉的方式不變，廣大市民在2017「一人一票」年普選特首之權利，就這樣被少數政客冷酷無情地剝奪了。反對派的所作所為，說明他們是香港民主發展過程中的攪局者、破壞者。香港要發展、要繁榮，必須要用手中的選票「票價票選」，從議會中剔走一心搞破壞的激進反對派，才能在穩定與安寧的社會環境中，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在各個社會、經濟和民生的議題上凝聚共識，發揚「同舟共濟」的香港精神，共同為香港的前途與繁榮發展而努力。



# 香港牌是亞投行的秘密武器

□沈旭暉

## 【議論風生】

國際社會對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反應踴躍，當創始成員國申請截止後，爭論轉到亞投行總部應落戶哪裡。除了中國北京以外，近月一直傳出印尼、沙特阿拉伯和韓國均爭取亞投行於該國城市設立總部。雖然觀乎事態發展，亞投行總部如無意外還是將設在北京；籌建亞投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主席、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3月在一發布會上重申，亞投行總部將設於北京，且該決定是根據各方在2014年10月一致同意簽署的《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似乎迴旋空間已不大。

## 香港依然有獨特優勢

雖然如此，基於香港是時候考慮自身在中國亞投行、「一帶一路」等部署下如何加強角色地位，我們也不妨想想：香港有資格成為亞投行總部嗎？退一步而言，亞投行能否設立數個「區域支部」，讓香港分享一個席位？

首先，亞投行總部或區域支部若設於香港，當能減

低一些外交層面的政治爭執。3月27日，智庫《東盟投資參考》（Asean Confidential）研究主管寶寧（Gavin Bowring）在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撰文，指北京並非亞投行總部的最佳選擇，因為會挑起國際對「中國中心論」（Sinocentrism）的恐懼。寶寧在文章中指，基於香港一貫的全球化城市定位，「亞投行總部設立於香港帶來的政治暗流會少得多」，並提到由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當年選擇落戶馬尼拉，就是要迴避類似的政治敏感爭議。但與此同時，香港依然在中國境內，服務中國外交利益，相比設在印尼、韓國等外地城市，更能符合中國的戰略思維。

而且香港在體制、文化上，依然有一定獨特優勢。相比北京，以至內地其他城市，香港的金融和法治體制都較能與國際接軌，加上歷史上作為轉口港、國際金融中心，一直擔當中國大陸與西方互通的門戶。加上在人民幣仍處於漫長的國際化階段，與美元掛鈎的港幣能在亞投行建立初期，較易獲得海外投資者信心。近年港珠澳大橋等基建，以至港府執意興建的機場第三跑道，不論其動機，客觀上都加強了接連珠三角與國際的硬件

部署。而香港的一些軟件配套，例如營商環境，以至整體英語水平，亦較中國其他城市更能與國際接軌。

說到底，香港的經濟狀況和財政結構相對穩定，即使去年爆發連串群衆運動，還是獲國際投資者認可。例如港府剛在5月28日發售伊斯蘭債券，是繼去年9月首次發行後再度成功發行，認購金額達20億美元；去年發行的首批10億美元伊斯蘭債券，認購金額更高達47億美元。這正好作為一個新鮮的例證，說明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讓香港足以擔當內地與國際社會之間的所謂「超級聯繫人」。

在籌辦會議方面，香港的經驗也十分豐富，雖然不能與國家首都層面的北京相提並論，但比起任何其他城市都不會遜色。例如2005年，香港主辦世界貿易部長級會議，頗獲外界好評，時任世貿總幹事蘇帕猜（Supachai Panitchpakdi）盛讚香港會議安排為歷屆最佳，其場地、設施、酒店、飲食等配套，以至自由的新聞資訊流通，都予國際社會一定信心。在亞投行成立後，將經常有各級部長、銀行首長以至國際組織會議，香港若作為舉辦城市，將能充分展現配套優勢。

## 做「區域支部」利多於弊

內地早前亦有聲音指，亞投行一類金融機構即使落戶中國，亦不應再集中於北京、上海等城市，而應遷往中西部，例如成都、西安，順勢帶動中西部經濟，開發更多能躋身國際大都會的中西部城市。其中西安是古絲綢之路終點，也是「一帶一路」下新絲路起點，有認為在西安設立亞投行總部，能有效融合亞投行、「一帶一路」、西部大開發等幾項中國大戰略。甚至也有意見指，即使亞投行總部落戶中國以外，也不應設於東南亞，而應考慮在中亞國家，借亞投行重心西移，進一步連結歐洲資金。不過，短期內這卻可能延緩了亞投行起步階段的影響力，未必符合借亞投行提升中國在全球金融市場地位的原意。

總括而言，「香港牌」依然是中國在亞投行的秘密武器。即使總部不便搬來香港，讓其承擔一個「區域支部」角色，對中國大外交而言，依然利多於弊。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